

关于一带一路研究课题 和 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针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支持的《一带一路博士研究生项目》的探讨)

演讲人： 张颖 教授¹（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副院长）

讲稿整理人：周楚乔²（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摘要：

本演讲是针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的中国“一带一路”博士生研究课题以及研究方法论的探讨，由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张颖教授在2017年2月7日给出的见解。本演讲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OBOR）现象及中国与世界历史格局问题；第二，企业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理论（paradox theory）问题；第三，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简单讲讲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问题。荷兰鹿特丹做为一带一路的终点站（之一），其意义对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们）做为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特别支持的学生来做这个项目，对双边地域和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我很理解你们接受到这个课题的兴奋心情，也理解你们所看到的做次课题的困难。地域大，层次多，问题多，而做为研究人员，所具备的理论解决方案却很少。这是难处，但同时也是好事。这意味着这次的地域性合作战略有望给整个经济管理理论界带来新的方向，有望颠覆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合理预期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理论误区。

首先，我先来说说你们“思考问题”的逻辑问题。

如我以前强调的，想什么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 phenomenon（现象）。永远都要先看现象，重点看这件事情是为的什么。现象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 puzzle（难题）。而作为博士研究生的你们，就是来解决难题的，看清“是什么”的问题，和解决“Why”（为什么）的问题。“Why”（为什么）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才能去解决“How”（怎么做）的问题。目前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设计的问题是不接地气，还没有搞清楚“What”（是什么）问题，就是“What is the phenomenon”（现象是什么？），就不要说“why puzzle”（为什么是难题）的问题了。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建议你们一定要多接地气，多了解社会，然后再说做学问的问题。

¹ Email: y.zhang@rsm.nl

² email: zhou@rsm.nl



咱们这里先不说 research question for this project（这个项目的研究问题），针对这个项目我先说一带一路（OBOR）这个现象？这是做什么的和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的问题。

当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逻辑上讲要先考虑（目前状况下）这是做什么的。了解现在的 OBOR 就得问自己为什么现在的 OBOR 是这个情况。要了解为什么，就肯定就了解 OBOR 的 history（过去）。举个例子，就像我看你。我说把你录取来做我的 PhD（博士研究生）学生，我得先 interview 一下（面试），除了得了解一下你的 resume（简历），对吧。对你的了解，首先是从你的简历开始的。研究任何一个现象或者问题如果连它的“resume”（简历）都没有看是不能开始研究的。这里的“resume”（简历）就是 history（过去）。从“resume”（简历）上我们可以就可以看出一个事物的发展轨迹，发展性格是什么，而这种性格又分为 local（本土化）性格和 global（全球化）性格。这两种性格在时间维度上又存在 time being（时间格局）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性格，即使通过你的过去（简历）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也是会变的。今天的你不代表明天的你。这种情况下，那这个“resume”（简历）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换句话说，是不是这个从 past（过去）到 current（现在），到 future（未来）的路径就不连贯了？你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总结来说，我们现在是在“current”（现在），“current”（现在）phenomena（现象）需要我们搞清楚“Why”（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Why”（为什么）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知道“How”（怎么做）的问题，知道“how to do in the future”（未来要怎么做）。那反过来讲，如果想知道“how to do in the future”（未来要怎么做），就得知道它过去是什么——What was it?（过去是什么？）What does the history look like?（历史是什么样的？）当你知道它过去是什么了，你才会逐渐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做的，才知道将来应该怎么做。

举个例子，我要录你做 PhD 学生，我要看你过去的 resume（简历），你是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是不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为什么呢？那我喜欢你就可以了，就可以录你了，为什么还要看这些东西呢？（博士生答：因为看 ability/能力）对，要看 capability（能力），这是一个方面。那为什么 capability（能力）重要呢？因为决定你能不能完成你将来的 task（任务）。那我现在要问了，OBOR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future task（未来的任务），对吧？那要问 future task（未来的任务）是什么？（博士生答：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对，这自然就出来了。这就是怎么把问题分析出来的，就是为什么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要作为看待“一带一路”（OBOR）的被解释变量。当你想明白的时候就可以写了，当你写明白的时候，别人才能看懂。当然你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博览群书，搞清楚来龙去脉和检查理论支持以及理论漏洞。

说了 future task（未来的任务）是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也可以是其他的），那继续问问题，为什么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要作为 future task（未来的任务）？和 OBOR 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用以上的分析逻辑再看历史和过去，过去的 Old Silk Road（古丝绸之路）是做什么的？是不是是为了 culture（文化），trade/economy（交易/经济），resources（资源）的交流？你看过去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还有一个“OBOR”（我们可以叫古一带一路），现在中国被称为生产力过剩，也有一带一路。过去生产力还没有过剩，为什么还要交易？还要文化交流？当然这是相对于当下的生产力说的。如果相对于那时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是世界遥遥领先。如果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又求发展，逻辑上讲，只有两条路：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是“抢”，这就是战争的出现的原因。在当时资源贫乏的情况下（虽然是盛世），古丝绸之路的拓展就意味着提高资源多样性和资源丰富度，这样人民生活水平自然就会提高，这是简单的国际交流贸易的好处。可交换资源的地域扩大了，财富就增加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讲，这也可以解释为 ambition（雄心），但这不是最根本和最底端的原因，根本原因是资源缺乏和期望资源丰富度。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 OBOR，中国资源缺乏吗？缺乏。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什么是资源？”过去我们说的资源是生产原材料或者是半成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人、有资金、有基本资源，但似乎只缺一样东西：standardization ruling（规则制定）或者我们说 standardization influencing（规则影响力）。古代是资源贫乏的情况下需要交换，是为了提高资源，其他国家也资源缺乏，还不如当时的中国，但 trade（交易）造就了古丝绸之路、中国的地域扩大、中国 reputation（声誉）/世界影响力以及 prosperity（繁荣）的提高，这些都是相互影响着上升的。但这些都是“果”，资源缺乏是“因”。两千年前，这些都造就了之后，才发现地球是圆的；中国是强大的；中国的技术，文化，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力成为了当时很多国家的 role model（标准），成为“盛世”。我们现在是经济的盛世，但还不能成为标准的 ruling（制定）或者 influencing（影响）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发展成本高的原因。

那问题又来了，是不是如果用 OBOR 这个方法就可以走到 standardization（标准）的 ruling（制定）上呢？这个 theme（主题）就是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二者是“twins”（双胞胎），没有 globalization（全球化）就不可能有 localization（本土化），没有 localization（本土化）也不可能去 globalization（全球化），但目前这个问题是没有被研究透。我们过去讲的都是 globalization（全球化）和做 IB（International Business/国际商务）有多好，因为做 IB（国际商务），所以经济能够上升。但有没有人讲因为做 IB（国际商务），所以经济会下降？现在很多国家和群体因为发展不好，反对全球化。全球化有问题吗？如果全球化被认为有问题，那到底是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的问题，还是全球化执行的问题呢？你们可以看看我在《中国日报》上发的文章。我们以后可以具体探讨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全球化造成利益以及问题直接的间接的都得又 localization（本土化）来实现和解决。一带一路虽然对中国来说是“出去”了，对外国来说是我们“进去”了，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全球化是否能够本土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是否能本土化？

下面我们说说 localization（本土化）？以你（一个博士生）为例，第一，你从成都过来上学，对你来说，你就是在做 globalization（全球化）。那你到这儿之后，本土化了吗？现在你考虑的问题是本土化的问题，出来之前是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一样的，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全球化的问题，下一步再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在你考虑全球化问题之前，又是（在成都）本土化的问题，这个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紧密相关的关系。第二，当你在考虑能不能本土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pair/match（匹配）问题，这个 pair（匹配）就是你是不是与当地的 social 和 culture（社会文化）吻合的问题，你是不是符合这边的标准（来的标准和出去的标准不一样）。好，我们说完例子，来说中国，中国现在经济强大了，可以进行全球化了，这个过程当中要 catch up standardization（赶上标准），是低到高的 catch up（追赶），看能否匹配。中国的企业出去了，到亚欧大陆，是一群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路朝西走的时候，先碰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再往西走碰到的是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South/理论上我们称为南国）走的时候本土化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目的是全球化，是本土化也要做到发达国家（North/暂且称为北国）。如果像青蛙跳一样，直接跳到北国，跳出残疾的可能性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做全球化的时候基本功都没练好，就好高骛远跳得太远，结果造成巨大损失。

我们以中国在 OBOR 这条路上以国家为单位“阶梯性”地发展于邻里的合作关系，先到发展中国家，再去发达国家，这条路是不是就走得比较轻松一些？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就



要把中国的标准放到发展中国家？歇一歇、赚赚钱再去发达国家？不是的，而是我们在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就在 transition（转型）。中国的发展经历和模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难找到参考去对比。千万不要用对比的方法去对比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国家，没有意义，也没有可比性，就像我们不能把自己跟别人比来发展，不能要求孩子和其他孩子比来要成绩一样。中国近几十年通过内部开放，外部适当开放的方式做到了稳定平稳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短期内，中国企业在国内通过和国外企业合作就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不胆怯走出去，尝试在外发展，把已有的财富和技术分享给其他国家。但这个过程说的简单，做起来不容易。要把一些领先的中国企业学到的标准用到发展中国家去，这个过程对中国企业来说是社会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大的福利，是在为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做准备，对它们来说等于是跨阶段前进。如此一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加快？就是这个逻辑！那么问题又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去 measure（度量）这个过程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国家为单位先派出大型国有企业做基础设施，再用领先的中国企业，如华为和联想，来帮助中小型企业“走出去”，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如何去科学度量呢？你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之前都是讲 why（为什么），接下来就是技术性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 measure（度量）。整个的 philosophy（思想体系）已经讲清楚了。现在研究的 puzzle（难题）是什么？Puzzle（难题）就是这个：能不能从发展中国家走到发达国家？就要讲这个事情合不合理。说服别人最好的办法是给证据，而证据就在过去（指古丝绸之路）；还有一个证据是中国过去是怎么做的，如果中国企业没有在 OBOR 上如何做的？比如说很多企业全球化的时候是现在亚非拉地区磨练，然后再去欧美地区，这是一个证据。还有一个可以实时跟踪的是看现有的企业是不是已经走过这条路了？这是在公司层面上。

在国家层面上，之前已经解释为什么要做 OBOR 了，这是一个长期路线，至少是一个一百年的规划。你们是经济管理方向的学生，要讲国家层面这样走是如何对一个国家发展是有利的，有利的 measure（度量）可以是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不要单纯用企业社会责任去看待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构念，如何拿着做企业社会责任的理由去做 commercial（商业化）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做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都是以很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所以这些企业在我的眼里都不是真正在做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法真的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而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为了 PR Marketing（公共关系营销）罢了。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真的在做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 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怎么走，这才是 innovation（创新），是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社会性创业），这个才是重点，才能在公司层面上达到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

个人层面上是一样的。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想赚钱，就不应该呆在学校里。但在学校里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可以教育更多的学生，这是在对社会做贡献，这也是社会责任。当然，这永远都是一个矛盾，economic（经济价值）和 social（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social（社会价值）是 inner（内在的），economic（经济价值）是 outer（外在的），这就是我上课讲的到底是什么来决定我们的 status（地位）。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穿名牌、开豪车？因为 status（地位），这是从 economic status（经济地位）出来的，而不是从 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来看的，因为这些象征会反映你的 economic status（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在现有的基础上显示的是你的 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而不是你的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这是两码事。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是说你的社会地位高不高，社会地位当真是由你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吗？国家首相工资不高，为什么社会地

位高呢？因为这里社会地位决定了社会价值，进而影响了经济价值并决定了其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在这个情境下已经不重要了。那为什么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价值高呢？因为这是由他们的经验和背景（包括文化、知识和信任）决定的。宏观来说，这是现在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决定。企业要做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要做企业社会责任的话，如果是从 commercial（商业价值）的角度出发，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须要从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出发，对吧？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做 OBOR，从 commercial（商业价值）出发，那就不用去发展中国家了，OBOR 不用从欧亚大陆出发，直接去西欧就可以了，直接到欧洲来赚钱。为什么要在发展中国家呢？在发展中国家赚不了钱，大部分是在做社会责任。国外媒体说中国在出口过剩产能，从这个角度来讲，直接出口到欧美就行了（这里我们先抛开关税壁垒的技术性问题），干嘛要到中间那么大一片“南国地带”和相对“地域政治不安全”的地方去，从很大的程度上讲这是从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出发的。“邻里发展好了，你自己自然更好了”。这个就和过去的古丝绸之路的逻辑又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结果意外的创造了很大的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造成了中国 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的上升；现在的新丝绸之路很大程度上是从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如果做一件事从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角度出发，economic（经济价值）是一定会有，这就是外国媒体说中国是要赚钱！（我们的结果是一样，但我们逻辑不一样）。

不管从哪个方向来讲，philosophy（思想体系）都是这个，就是对将来的预测。理论上来说，中国将来能不能从 S₁ 到 N₂（南国 1 阶段发展到北国 2 阶段）就是一个几十年要看的问题，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只有一点，就是有没有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在心中。为什么大家都想做 ruler（规则制定者）？因为 ruler（规则制定者）就代表你不是 citizen of the earth（地球公民），而是 ruler of the earth（地球统治者）。为什么做 earth ruler（地球统治者）这么重要，因为 earth（地球）代表的是 resource（资源），所以我们能看到抢夺资源的现象。为什么都要抢 resource（资源）呢，（答：power（权力））对，因为和 power（权力）相关。为什么都要抢 power（权力）呢，因为 status（地位）。为什么 status（地位）这么重要，反过来这是个三角论，因为要 resource（资源）。要跳出 box（“盒子”）来看，是因为 system（制度）的问题，是个不平等的 system（制度）。没有完全民主和完全专制，西方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如果真的专制的话就不会做 OBOR，专制是看在什么情况下专制。所以归根结底是全球资本发展的 system（制度）的问题，OBOR 如果把这条线走通了，很有可能就解决世界格局下的社会经济的 system（制度）问题，这是一个利好的事！目的是帮助大家最终达到一个平等的 system（制度）。平等就能促进 infinity（无极，也叫空），当每个人平等时，就没有 status（地位）和 power（权力）争夺的问题。这些说到底是一个 attitude（态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attitude（态度）是由 value（价值）决定的，个人 value（价值）是由其 social value（社会价值）决定的，social value（社会价值）是由 ruling（制定规则）的 notion（概念）决定的，而 ruling 是由教育决定的。所以可见教育的可贵性啊。

作为博士生的你们，要做的是如何从理论的角度帮助中国，why（为什么）说清楚了，假设的论证就说清楚了，那现在就是 how（怎么做）的问题了，是你们要做的问题，就要把整个故事细化了，第一步先是“出来”——全球化。还有一个是因果问题：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能产生果是因为“因”发生在“果”之前，“果”能变成“因”是因为还有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成为将来的因。但如果把时间全都压缩在一个点上，因果就重合了，因果重合的意义就是你这件



事情做的是不是在这一点上为整个群体而考虑。（panel data（面板数据）看的是一群人在一段时间里的事，现在把时间全部压缩到一个面上，看的就是一群人，就是 social（社会）角度）所以归根结底，OBOR 就是一个 social（社会）的问题。再者说，localize in North（向发达国家的本土化）结束了，又要回去 localize in（本土化），这个 circle（循环）、轮回。Globalization（全球化）这个 G 只是一个 progress（过程）。永远都是在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上在跳——螺旋式上升。在时间上看，North 1 和 North 2 不是同一个国家或人，因为旋转了，可能 S₁ 就等于 N₂ 了，那 N₂ 就到 S₂ 了，就是中国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合作的结果。中国现在做 OBOR 是可以扭转从 S₁ 转到 N₂ 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 S₁₁, S₁₂, ..., S_{1n}，这条路是一条荆棘之路，直线距离走的时候很快，但是一条荆棘之路，过程中一群“难兄难弟”，要真的想直接过去，就得好好使用 OBOR，就要让它们先文明起来，然后再发展经济。当 N₁（北国 1）看到 S₁（南国 1）发展到它前面去了，肯定会反对，但是“反对无效”，于是就会出现极右翼的做法，这就是现在美国和英国脱欧在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走上不归路了，跑到 S₂ 去了。

这些都是 brain experiment（思维实验）的过程，你就可以选 inductive methodology（归纳法）去探讨这个 phenomena（现象），extend or build a new theory（扩展或建立一个新理论），你也可以 deductively（演绎法）根据现有的 theory（理论）去 test（验证）现在的状况，或者在 proposition（命题）下做一个 experiment（实验），predict the probability of this pos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预测这种可能性和有效性的概率）；方法很多，但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来定。如果是一个管理类的研究问题，还是要着重解决公司和个人角度的问题。然而前提是要了解大环境，这是我们很多管理类研究人员忽略的。在我看来，任何问题都要从为解决实际 phenomena（现象）和 puzzle（难题）出发，以能为 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乎道德（ethical）的解决方案为出发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面正确地了解 country（国家），regional（区域），continental context（大陆板块的背景），和公司、个人层面的问题，知道如何把各个层面的问题联系起来，找到根源，分析解决，这才对得起你作为社科类研究员的使命，对得起国家投这么多的钱送你来读书。为什么说解决公司问题时，又要考虑 context（背景）（国家层面），又要考虑 individual value（个人价值）（个人层面）呢，这两个问题不考虑，公司问题这个“bridge”（桥梁）没有办法做。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bridge（桥梁）问题，其实就是一个 sample（样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 sample（样本）的问题呢？很多人组成一个组织，很多组织组成一个国家。要看人群体的问题，看一个组织就可以；看一个国家的问题，看一个组织就可以。要解决国家问题，先解决一群组织的问题就可以。所以组织，也就是说 corporate（公司）层面是最重要的，business（商业）是最重要。Business（商业）又是养活个人的，大家都在 business（商业）工作以求生计，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纽带。要解决这个纽带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端的问题。要接地气，要知道全世界在发生什么，要知道 phenomenon（现象）是什么；个人层面要和自我、和他人对话，要先了解两端，才能解决中间的问题。

好了，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

Ying Zhang

07-02-2017

